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对劳动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测算^{*}

刘 蓉 寇 璇

内容提要:我国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推出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是我国税制改革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将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税制结构调整以及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通过微观模拟预估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改革前后家庭缴纳的个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基尼系数、帕累托最优标准,测算和评价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对家庭劳动收入的再分配效应。研究发现,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社会的整体福利得到提升,收入分布更接近帕累托最优。

关 键 词: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 再分配效应

作者简介:刘 蓉,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611130;

寇 璇,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611130。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9)05-0039-13

一、引 言

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关于工资薪金的费用扣除标准问题一直是社会公众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自198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经历了2006、2008、2011年三次调整,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月依次提高到1600元/月、2000元/月和3500元/月。上述改革举措是期望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减小居民收入差距。然而,现有文献实证研究表明,实行分类计征的个人所得税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孙玉栋、庞伟,2017);并且,2011年的税收改革弱化了本来就十分微弱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岳希明等,2012)。2018年8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主要在免征额度、收入级距、专项附加扣除、征收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转变。因此,评估本次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为制定符合国情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提供定量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减税政策的可持续性与社会福利效应研究:基于税制板块联动效应的视角”(71473199)。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意义与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政策分析与评估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个人所得税改革进行收入分配等实际效应评估,集中研究了个税改革对收入分配(岳希明等,2012)、劳动供给(刘怡等,2010;叶菁菁等,2017)、社会福利(许志伟等,2013)、消费(王鑫、吴斌珍,2011;黄晓虹,2018)等方面的影响,此类文献主要基于2005年、2011年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的政策事实和改革前后的数据进行定量对比分析。比如刘怡等(2010)、叶菁菁等(2017)分别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2006年微观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201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估计了个税费用扣除标准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许志伟等(2013)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个税改革对微观个体的消费储蓄决策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从福利效应的角度对2011年工薪所得税改革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第二类文献是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进行微观模拟研究。由于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效应会经历从收入分配状态改变到个体劳动供给行为改变,再到收入分配状态改变的过程,因此部分学者沿着这一变化脉络,继续采用静态和动态微观模拟方法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估。静态微观模拟通过计算税收规则变动导致的首轮收入分配效应,预测新政策的短期实施效果(雷根强、郭玥,2016);动态微观模拟通过估算劳动供给反应方程,对劳动供给效应和次轮收入分配效应进行评估(张世伟、周闯,2010;尹音频、杨晓妹,2013;万相昱,2018),以预测长期的政策效果。

针对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分析,国内学者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研究(贾康、梁季,2010;田志伟等,2017)。由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复杂性特点,部分学者采用微观个体数据定量研究了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例如徐建炜等(2013)利用1997—2009年城市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考察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和再分配效应,发现我国个税累进性较高,但平均税率偏低,导致个人所得税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较弱。张楠和邹甘娜(2018)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数据,测算个税在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的收入分配效应,对比发现,由于目前个税以个人为计税单位,在家庭层面更难达到横向公平。雷根强和郭玥(2016)利用CFPS 2012年数据,对在劳动所得综合收入中引入差别费用扣除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效果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差别扣除能更好地匹配纳税人的个人和家庭负担,体现税收量能负担原则。由此可以看出,采用微观数据模拟测算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效应不仅可行,而且可靠。因此,我们拟采用静态微观模拟方法对本次个税改革的政策效果进行测算,综合考察专项附加扣除等税制要素调整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为进一步的个税改革提供数据支持和政策分析。

基于已有文献,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微观抽样调查数据,此数据很好地涵盖了模拟个税改革所需的家庭和家庭成员关系、家庭住房和个人劳动收入等情况,为计算针对异质性个人和家庭的专项附加扣除提供了可能。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新税制下的微观模拟规则 and 数据处理情况,第三部分对处理后的微观收入数据进行描述统计与个税计算,第四部分分析本次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下的微观模拟规则和信息识别

2018年个税改革主要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性所得作为综合所得,并将其基本扣除(原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由3500元/月提高至5000

元/月,同时,在此基础上增加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六项支出的附加扣除。按照税法规定,综合所得、经营所得(即劳动所得)按月预缴,年度汇算清缴。因此本文假定每个人的月劳动收入额为年劳动收入的月平均值,计算月劳动收入应纳税额=(月劳动所得-5000-专项附加扣除)×对应税率-速算扣除数,家庭劳动收入应纳税额为家庭中各纳税者应纳税额之和。具体个税税制结构及其税率见表 1。

表 1
 2018 年新个人所得税税制结构及其税率和扣除标准一览

所得分类		劳动收入					非劳动收入			
		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	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	财产 租赁 所得	财产 转让 所得	偶然 所得
		工资薪金 所得	劳务报酬 所得	稿酬 所得	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					
应 纳 税 额 的 计 算	收入额	全 额	全 额 × (1 - 20 %)	全 额 × (1 - 20 %) × 70 %	全 额 × (1 - 20 %)	全 额	全 额	全 额	全 额	全 额
	扣 除 项 目	基本扣除标准		6 万元(年 · 人)		成 本 、 费 用 和 损 失		800 元/ 20 % 的 费 用	财 产 原 值 和 合 理 费 用	
		专项扣除		社 保 及 住 房 公 积 金						
		专项附加扣除		子 女 教 育 、 继 续 教 育 、 大 病 医 疗 、 住 房 、 赡 养 老 人						
		其他扣除		特 定 商 业 健 康 保 险 、 养 老 保 险 、 企 业 年 金 等						
	适用税率	3 % ~ 45 % (7 级超额累进税率)					5 % ~ 35 % (超额累进税率)	20 %	20 %	20 %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整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5 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设计、多阶段 PPS 抽样方法从全国城乡分范围抽样,调查了全国除西藏、新疆和海南以外的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0968 户家庭的 19574 名个人,该调查的抽样设计以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总体信息(罗楚亮、李实, 2019),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国人口的代表性。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提取被访者及其配偶的劳动收入信息,以及其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家庭住房和资产情况等相关变量,以识别个人和家庭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专项附加扣除的资格或者数额。测算过程中,具体的应纳税所得额、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和标准设定,以及数据的处理情况介绍如下。^①

1. 家庭劳动收入

我们筛选出报告了自己 2014 年劳动收入和总收入的个体,剔除在校学生和收入信息缺失的个

① 本文根据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确定微观模拟规则,并计算家庭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

体,所得样本总数为 9695 户家庭,涉及 17349 个成年人。根据问卷中“A8b. 您个人去年(2014 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是多少”、“A75b. 您配偶或同居伴侣去年(2014 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是多少”这两个变量确定家庭中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两个数据加总确定家庭劳动收入。通过“A59a. 您的工作状态”和“A82. 您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工作状况”筛选出个体工商户,其劳动收入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且不适用专项附加扣除制度。通过“A54. 您上一周没有工作的原因是什么”、“A77. 您配偶或同居伴侣上一周没有工作的原因是什么”两个变量筛选出在校学生和离退休老人。由于税法规定退休人员再任职需要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样本中部分离退休老人的退休金可视为非职业收入,所以我们依据“A53. 您(A76. 您的配偶)上周是否从事任何以获得经济收入为目的的工作”识别离退休老人的总收入是否属于劳动收入,若其选择“未从事任何以获得经济收入为目的的工作”选项,则将其总收入视作退休金,不计算个人所得税。为了更加合理地估算应纳税额,本文采用各省的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指数将 2014 年劳动收入数据转化为 2018 年的劳动收入数据。

2. 个人基础扣除

综合所得的免征额为 6 万元(年·人),即 5000 元(月·人)。

3. 专项附加扣除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中列举了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其中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无法预测,因此本文暂不考虑该项扣除,其余五项专项附加扣除的识别规则如下。

(1) 子女教育扣除

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年 12000 元(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由于该问卷的调查时间为 2015 年,该年度的未成年子女到 2018 年正好在 3~22 岁区间内,即通常进入学前教育至完成大学本科的年龄之间,因此,我们根据问卷中“A68a. 请问您有几个 18 岁以下未成年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来统计 2018 年年年龄在 3~22 岁之间的子女人数。考虑到存在子女已婚或者经济独立等情况,本文通过问卷“1. 家庭成员关系表”中的“家庭成员与您的关系”、“年龄(周岁)”、“婚姻状况”和“经济是否独立”四个指标对子女人数进行校对修正。用符合条件的子女人数乘以 1000 元标准扣除额,即为每月子女教育扣除额。

(2) 继续教育扣除

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接受学历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教育期间按照每年 4800 元(每月 400 元)定额扣除。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年度,按照每年 3600 元(每月 300 元)定额扣除”。我们假定被访者在 2018 年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与访问时一致,通过问卷中“D41. 过去 12 个月,您是否参加过提高工作技能的培训”这一问题确定被访者继续教育的扣除资格,并统一按照 300 元/月扣除。

(3) 房贷利息扣除

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本人或配偶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偿还贷款期间,可以按照每年 12000 元(每月 1000 元)标准定额扣除。非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纳税人不得扣除。纳税人只能享受一套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因此,我们通过问卷中的“C13. 如果您和配偶或同居伴侣卖掉房产,并且把房贷或因买(建)房而欠的个人债务还清,还剩多少钱”来识别被访家庭是否有住房贷款,通过“C121.

您和您的配偶是否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和“C122. 您和您的配偶是否有两套及以上自己的住房”来识别是否符合房贷利息扣除资格。

(4) 房屋租金扣除

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本人及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没有住房,而在主要工作城市租赁住房发生的租金支出,可以依据承租住房所处城市类型分别按每月 1500 元、1100 元、800 元标准定额扣除”。因此,我们通过“A128. 您现在这座房子的产权属于”中“家人/亲戚以外的个人或单位所有,这所房子是租来的”这一选项来判断被访者是否有房租支出。由于问卷中不包含被访者承租住房所处城市类型的相关信息,我们将房屋租金的扣除标准统一假定为暂行办法规定的中间值,即按每月 11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5) 赡养老人扣除

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赡养 60 岁(含)以上父母以及其他法定赡养人的赡养支出可扣除,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年 24000 元(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非独生子女则分摊。纳税人赡养 2 个及以上老人的,不按老人人数加倍扣除”。为确定赡养老人支出的扣除额,我们通过问卷“1. 家庭成员关系表”中的“家庭成员与您的关系”、“年龄(周岁)”来判断被访者是否存在赡养支出和兄弟姐妹人数,用 2000 元除以兄弟姐妹总人数,即为每月赡养老人扣除额。

暂行办法规定,子女教育扣除、房屋贷款利息扣除、住房租金扣除,可由夫妻双方约定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变更。为避免夫妻双方出现重复扣除,本文在计算个税应纳税额时,筛选劳动收入较高的一方进行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

4. 家庭供养人数

拥有相同收入的家庭,会因为家庭内部不同人口状况产生不同的福利效果(张楠、邹甘娜,2018),所以评估个人的家庭收入再分配效应需要考虑家庭规模,因此我们同时采用家庭劳动收入和家庭人均劳动收入来评估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其中,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 家庭劳动收入/家庭供养人数。由于本数据库仅包含被访者及其配偶的收入情况,无法获取其他家庭成员的劳动收入数据,鉴于此,本文在衡量家庭供养人数时,仅考虑由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即家庭供养人数 = 被访者及其配偶人数 + 经济未独立的未成年子女数。其中,被访者及其配偶人数通过“A69. 您目前的婚姻状况”变量判断,^①未成年子女数与前文享受子女教育扣除的人数一致。

三、微观家庭劳动收入分布及其个人所得税估算

研究税收制度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离不开对税基的刻画(叶菁菁等,2017)。专项附加扣除额依据家庭的实际负担确定,因此家庭劳动收入的分布情况必定会影响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根据前文介绍的识别和计算规则,本文将样本中的家庭劳动收入数据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前后的个税数额进行估算。

从样本中的家庭劳动收入水平来看(见表 2),全国家庭劳动收入均值为 7.03 万元,家庭人均劳动收入的均值为 3.56 万元。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家庭劳动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均值分别为

① 若被访者为“离婚”、“未婚”、“丧偶”或“同居”的情况,则被访者及其配偶人数为 1 人;若被访者为“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的情况,则为 2 人。

10.02 万元和 5.23 万元,而中部地区分别为 5.14 万元和 2.53 万元,西部地区最低,分别为 4.51 万元和 2.27 万元。这与我国居民收入的实际情况一致。

从家庭劳动收入的分配差距来看,根据样本数据计算(见表 4),全国家庭劳动收入的税前基尼系数为 0.5403,家庭人均收入的税前基尼系数为 0.5387,均大于国际警戒线(0.4),说明我国整体的家庭劳动收入差距较大;进一步从城乡内部收入差距来看,城镇家庭劳动收入的税前基尼系数为 0.4962,家庭人均收入的税前基尼系数为 0.4850,分别小于农村的 0.5401 和 0.5470,同时,城市内家庭劳动收入位于中位数以下的家庭总劳动收入仅占城市样本总劳动收入的 18.36%,这一指标在农村更低,为 13.32%,说明农村家庭的劳动收入差距更大,两极分化更为严重。

表 2 家庭样本的劳动收入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单位:元、个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家庭样本数
全国	家庭劳动收入	70283.29	119557.90	1001.41	3960288	44956.18	9695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35646.55	61380.30	259.23	1980144	23056.44	9695
东部	家庭劳动收入	100204.55	151940.00	1001.41	3866140	66166.25	3934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52374.07	76301.89	522.48	1933070	37553.01	3934
中部	家庭劳动收入	51408.01	71922.89	1021.86	1473251	36297.54	3360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25330.39	39064.83	340.62	1049518	17284.54	3360
西部	家庭劳动收入	45075.95	100320.40	1007.64	3960288	27013.72	2401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22675.39	52584.59	259.23	1980144	13309.13	2401
城市	家庭劳动收入	90286.34	140594.7	1001.414	3960288	63622.29	5777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46654.82	70699.05	529.33	1980144	32553.79	5777
农村	家庭劳动收入	39198.28	68351.62	1270.392	256141.6	25614.16	3918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19415.12	38875.35	704.4083	131751.1	12338.14	3918

根据全国样本数据,我们绘制出家庭劳动收入与人均收入的分布图(见图 1),样本中 61.2% 的家庭年劳动收入在 6 万元以下,而年劳动收入在 12 万以上的家庭仅占 13.9%。从收入分布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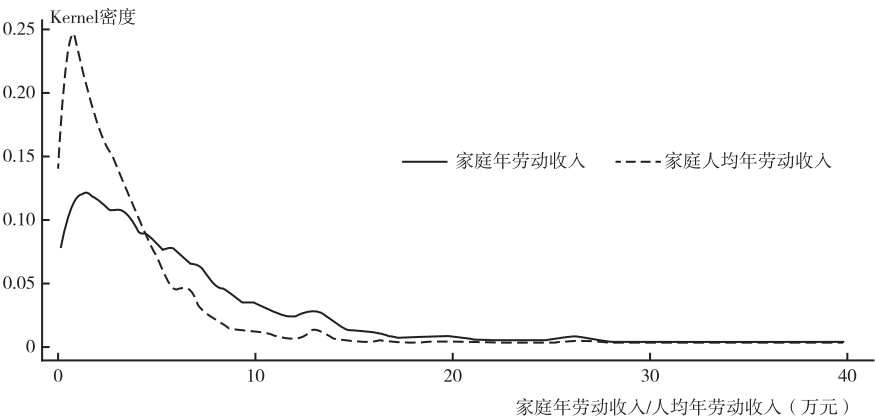


图 1 全国样本家庭年劳动收入分布核密度估计

注:本图样本中剔除了年家庭劳动收入在 40 万元以上的样本(约占总样本的 1.25%)

以看出,样本中大部分家庭受到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仅可能惠及其余 40% 中的部分家庭。

本文对家庭劳动收入在有无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两种情形下的应纳税额进行计算、对比发现,不实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时,缴纳个税的家庭占比为 21.45%,而实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时,该比重下降至 16.43%,其中仅 13.71% 的家庭应纳税额下降,其余 2.72% 的家庭应纳税额保持不变。

本文按被调查者的年龄对家庭样本进行分组,从不同年龄段的家庭平均税负情况可以看出以下几点(见表 3)。第一,无专项附加扣除的平均家庭税负仅为 0.56%,而有专项附加扣除的平均家庭税负降至 0.45%,说明我国平均税负过低,个税的再分配效应不强。第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对 36~45 岁年龄段的家庭劳动收入的减税力度最大,26~35 岁、46~55 岁年龄段次之,而对 55 岁以上家庭的减税力度最小。显然,中间三个年龄段在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中受益最多,同时其家庭负担也相对最重,例如 36~45 岁年龄段家庭在子女教育、继续教育、房贷利息和赡养老人四项扣除的人数占比最高;而 26 岁以下的家庭大多还未生育子女,父母也还在工作;55 岁以上的家庭负担较小,同时大部分纳税人已退休,工资收入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综上分析,微观数据的统计结果较好地体现了社会的现实情况。

表 3		不同年龄段家庭劳动收入平均税负变化情况对比						单位: %
年龄段	平均 税率 1	平均 税率 2	专项附 加扣除 减负率	享有扣除资格人数占比				
				子女教育 扣除	继续教育 扣除	房屋租金 扣除	房贷利息 扣除	赡养老人 扣除
26 岁以下	0.4349	0.3877	10.85	9.09	3.03	25.76	2.27	26.89
26 ~ 35 岁	1.0691	0.8619	19.38	37.48	4.93	27.78	4.23	76.13
36 ~ 45 岁	1.1955	0.8936	25.25	63.05	5.06	18.23	6.24	77.72
46 ~ 55 岁	0.6954	0.5719	17.76	24.42	2.19	12.23	6.21	63.08
55 岁以上	0.1214	0.1142	5.93	1.16	0.32	7.19	5.13	2.39
全样本	0.5649	0.4548	19.49	21.81	2.24	13.58	5.52	39.25

注:“平均税率 1”表示无专项附加扣除的平均税率,“平均税率 2”表示有专项附加扣除的平均税率。“专项附加扣除减负率”表示专项附加扣除导致家庭应纳税额减少的平均比率,计算公式:专项附加扣除减负率=(平均税率 1-平均税率 2)/平均税率 1。

四、个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一)收入再分配效应的评价方法

衡量收入分配的方法有基尼系数、K 指数、洛伦兹曲线、帕累托分析等,本文选用基尼系数和帕累托分析作为收入分配的评价方法。基尼系数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得出,用以判断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而帕累托分析则是基于效率与公平原则,用以评判个税改革对收入分配效率的影响。

1. 基尼系数法

基尼系数是应用最广泛的测度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也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方法之一。

由于微观数据的信息量掌握较为充分,一般采用非参数的点估计方法计算基尼系数(杨耀武、杨澄宇,2015)。根据 Gini(1912)最初的定义,离散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等于基尼相对平均差的二分之一(徐宽,2003),样本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G = \frac{1}{2n^2\mu} \sum_i^n \sum_j^n |x_i - x_j| \tag{1}$$

其中, n 为样本数, μ 为劳动收入均值, $|x_i - x_j|$ 是样本中两两收入的绝对离差。本文通过计算 MT 指数来测量个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Musgrave 和 Thin(1948)提出了 MT 指数,该指数用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之差表示:

$$MT = G_x - G_y \tag{2}$$

G_x 、 G_y 分别表示税前、税后基尼系数。如果税收具有收入再分配效应,则基尼系数会下降,即 MT 指数大于 0;而当 MT 指数小于 0 时,则说明税收政策在收入分配方面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加剧了收入不公平。

2. 帕累托分析法

帕累托分析法最早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提出,他在研究收入分配时,通过把统计数据中个体的收入按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依次累积得到收入分布曲线,由此发现著名的“二八定律”,随后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生产和管理领域,其中日本学者中田勇(1987)认为以前的帕累托分析主要依靠经验观察得出管理对象分类的大致比例,为了获得最优分类点,他在帕累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VE 系数曲线,并通过等分分析法找出最优分类标准,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进一步,贺金社(2011)借鉴中田勇(1987)的等分分析的思想,将其引入收入差距研究领域,并对该方法进行改进和经济理论分析,提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帕累托最优曲线标准。

根据贺金社(2011)的研究,本文将该方法介绍如下:如图 2 所示,帕累托收入分布曲线是通过把全体成员的收入由高到低排列并依次累积而得,反映了累计劳动百分比与其对应收入百分比的关系。帕累托最优曲线呈严格圆形,反映了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效率”标准要求一定投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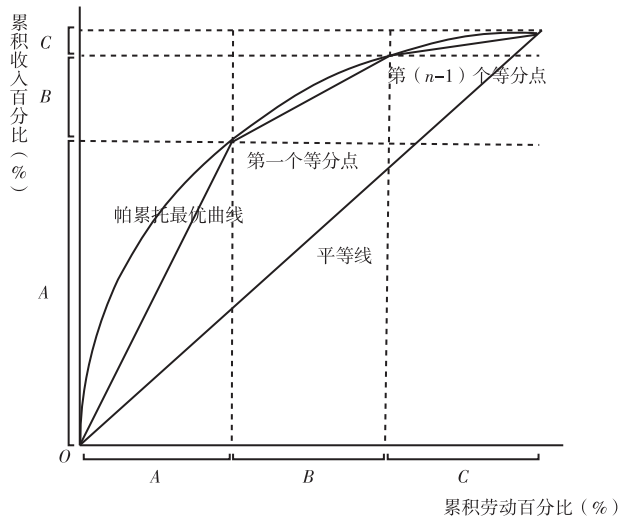


图 2 帕累托最优曲线

有最大产出,即累积的总收入(即曲线与横轴所围成的面积)最大;“公平”标准要求收入均等,即曲线距离平等线最近(曲线长度最短)。给定周长时,包含面积最大的曲线是圆,由此写出帕累托最优曲线的方程:

$$(L-1)^2-W^2=1 \tag{3}$$

其中, L 表示累计劳动百分比, W 表示累计收入百分比。严格圆形的帕累托最优曲线没有偏向,在保证社会总收入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够保证各个阶层的收入最大化。真实的劳动-收入累积曲线与帕累托最优曲线越接近,则达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否则收入分配存在效率或公平损失。

(二)收入再分配效应的评估结果

为了考察本次个税改革中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对劳动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本文分别测算全国样本、城乡样本、三大区域样本和不同收入组样本的税前、税后基尼系数,以求更加全面地展示专项附加扣除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家庭劳动收入的影响。

表 4 汇报了全国、城市和农村再分配效应的估算结果。就全国而言,在不实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个税规则下,家庭劳动收入的 MT 指数为 0.0186,家庭人均收入的 MT 指数为 0.0171,而实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家庭劳动收入与人均劳动收入的 MT 指数分别下降至 0.0173 和 0.0160,再分配效应相应减少 0.26% 和 0.22%。说明在目前家庭劳动收入分布、基本扣除标准既定的情况下,专项附加扣除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基本扣除(5000 元/月)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从城乡样本来看,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实行对城市家庭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削弱较大,使得家庭劳动收入和人均劳动收入的税后基尼系数分别增大 0.0015 和 0.0012;而从区域样本来看(见表 5),该制度的实行对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其中对东部地区的家庭劳动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其两项收入税后基尼系数分别增大 0.0017 和 0.0014。

测度指标	全国		城市		农村	
	家庭劳动收入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家庭劳动收入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家庭劳动收入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税前基尼系数 (G_x)	0.5403	0.5387	0.4962	0.4850	0.5401	0.5470
税后基尼系数 1 (G_y)	0.5217	0.5216	0.4732	0.4641	0.5295	0.5356
税后基尼系数 2 (G_y)	0.5230	0.5227	0.4747	0.4653	0.5304	0.5363
MT 指数 1 (MT)	0.0186	0.0171	0.0230	0.0209	0.0106	0.0114
MT 指数 2 (MT)	0.0173	0.0160	0.0215	0.0197	0.0097	0.0107
再分配效应 1 (%)	3.5653	3.2784	4.8605	4.5003	2.0019	2.1285
再分配效应 2 (%)	3.3078	3.0610	4.5292	4.2338	1.8288	1.9952

注:税后基尼系数 1、MT 指数 1、再分配效应 1 表示在无专项附加扣除情况下的指标值,税后基尼系数 2、MT 指数 2、再分配效应 2 表示在有专项附加扣除情况下的指标值。其中,MT 指数 1 = 税前基尼系数 - 税后基尼系数 1,MT 指数 2 = 税前基尼系数 - 税后基尼系数 2;再分配效应 1 = MT 指数 1/税后基尼系数 1 × 100%,再分配效应 2 = MT 指数 2/税后基尼系数 2 × 100%。下同。

收入再分配效应的评估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实施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会削弱个税对劳动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会导致居民的劳动收入差距加大。根据规定^①,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均为定额扣除,个人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总额随家庭负担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另外,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额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扣除不完的,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扣除。对于年劳动收入高于6万元的个人来说,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无疑会减轻其个税负担,而且收入越高的个体,享受全额扣除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年劳动收入低于6万元的个人,则只能享受基本费用扣除带来的减税效应,无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带来的税负减少。因此,尽管提高基本费用扣除和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对中低收入者也有一定的减负效果,但给中高收入者带来的相对收益反而更大(雷根强、郭玥,2016)。在样本的家庭劳动收入分布不变的情况下,差别扣除的量能负担原则难以有效实现。

表 5 三大区域个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估算结果

测度指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家庭劳动收入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家庭劳动收入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家庭劳动收入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税前基尼系数(G_x)	0.5023	0.4930	0.5112	0.5095	0.5425	0.5461
税后基尼系数1(G_y)	0.4800	0.4718	0.5006	0.4983	0.5352	0.5381
税后基尼系数2(G_y)	0.4817	0.4732	0.5016	0.4991	0.5358	0.5385
MT 指数1(MT)	0.0223	0.0212	0.0106	0.0112	0.0073	0.0080
MT 指数2(MT)	0.0206	0.0198	0.0096	0.0104	0.0067	0.0080
再分配效应1(%)	4.6458	4.4934	2.1175	2.2476	1.3640	1.4867
再分配效应2(%)	4.2765	4.1843	1.9139	2.0838	1.2505	1.4113

表6汇报了按照家庭平均劳动收入水平分组的收入分配效应估算结果,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低收入组的MT指数1、MT指数2均接近于0,即不管是否实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税前、税后的基尼系数差异均趋于零,说明个税(包括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对低收入组的家庭劳动收入基本没有调节作用,因为基础扣除额从3500元/月提高到5000元/月,导致绝大多数低收入者被排除在个税征收范围之外;其次,中等收入组家庭人均劳动收入的MT指数1和MT指数2相近,分别为0.0028和0.0022,说明个税对中等劳动收入家庭的人均劳动收入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实施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后,个税的再分配效应有所减弱,这可能是因为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导致一部分中等劳动收入个体的个人所得税得到减免,加大了组内的收入差距;最后,中高收入组的MT指数1和MT指数2差异不大,且家庭劳动收入和人均劳动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值分别在12%、10%左右,且家庭人均劳动收入的再分配效应2与再分配效应1非常接近,说明个税对中高收入组家庭劳动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明显,而且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实施对缩小中高收入家庭组的组内差距无负面影响。

① 具体规定详见《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等内容。

表 6
 不同收入组内个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估算结果

测度指标	低劳动收入组		中等劳动收入组		中高劳动收入组	
	家庭劳动收入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家庭劳动收入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家庭劳动收入	家庭人均劳动收入
税前基尼系数 (G_x)	0.0478	0.0466	0.1346	0.1782	0.3486	0.3960
税后基尼系数 1 (G_y)	0.0477	0.0466	0.1333	0.1754	0.3107	0.3614
税后基尼系数 2 (G_y)	0.0478	0.0466	0.1335	0.1760	0.3116	0.3614
MT 指数 1 (MT)	0.0001	0.0000	0.0013	0.0028	0.0379	0.0346
MT 指数 2 (MT)	0.0000	0.0000	0.0011	0.0022	0.0370	0.0346
再分配效应 1 (%)	0.2096	0.0000	0.9752	1.5964	12.1983	9.5739
再分配效应 2 (%)	0.0000	0.0000	0.8240	1.2500	11.8742	9.5739

进一步,我们将家庭劳动收入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①再将其等分为五个收入阶层,计算各组平均家庭劳动收入及其占全体劳动收入的比重(见表 7)。依据帕累托分析法中的最优曲线标准,本文计算出的五等分最优帕累托标准依次为 60%、20%、11.65%、6.33%、2.02%,即对于前 20%的高收入家庭,其总劳动收入帕累托最优标准为 60%,而最后 20%的低收入家庭为 2.02%。从表 7 中不难发现,对比帕累托最优标准,无论全国,还是城市和农村,收入分配总体上偏向后 80%的较低收入阶层,因而公平有余、效率不足;比较表 7 中有无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两种情况,发现实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收入分布更接近于帕累托最优曲线,这说明实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后整体的效率得到提升。具体来看,实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后,6 万元以下的个人年劳动收入免于征收个税,而 6 万元以上的个人年劳动收入个税减少,因此对于劳动人群中的中高收入者来说,福利增加,社会整体效用得到提高。

表 7
 各阶层的家庭劳动收入分布情况
 单位:元、%

范围	项目	最低收入户(10%) 和低收入户(10%)	中等偏下户 (20%)	中等收入户 (20%)	中等偏上户 (20%)	高收入户(10%)和 最高收入户(10%)
全国	平均税后家庭收入 1	7456.29	24400.08	44974.41	73837.32	184776.55
	占全体比重 1	2.22	7.27	13.41	22.01	55.09
	平均税后家庭收入 2	7456.29	24400.08	44974.41	73889.94	185937.42
	占全体比重 2	2.21	7.25	13.36	21.95	55.23
城市	平均税后家庭收入 1	16054.98	39302.49	62454.62	94655.64	220900.40
	占全体比重 1	3.70	9.07	14.41	21.84	50.97
	平均税后家庭收入 2	16054.98	39302.49	62476.88	94790.43	222492.30
	占全体比重 2	3.69	9.03	14.36	21.79	51.13

① 按照家庭劳动收入排序和按照家庭人均劳动收入排序得出的结论一致,这里仅报告按家庭劳动收入排序计算的结果。

续表 7

范围	项目	最低收入户 (10%) 和低收入户 (10%)	中等偏下户 (20%)	中等收入户 (20%)	中等偏上户 (20%)	高收入户 (10%) 和 最高收入户 (10%)
农村	平均税后家庭收入 1	3881. 38	12070. 33	24492. 79	42612. 94	108238. 03
	占全体比重 1	2. 03	6. 31	12. 80	22. 28	56. 58
	平均税后家庭收入 2	3881. 38	12070. 33	24492. 79	42612. 94	108663. 66
	占全体比重 2	2. 02	6. 30	12. 78	22. 23	56. 67
帕累托最优标准 (%)		2. 02	6. 33	11. 65	20. 00	60. 00

注:平均税后家庭收入 1 表示无专项附加扣除下的平均税后家庭劳动收入,平均税后家庭收入表示有专项附加扣除下的平均税后家庭劳动收入;占全体比重 1 表示平均税后家庭收入 1 占各组平均税后家庭收入之和的比重,占全体比重 2 表示平均税后家庭收入 2 占各组平均税后家庭收入之和的比重。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CGSS 2015 微观调查数据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成员信息以及家庭资产信息,分别预估了有无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两种情况下家庭劳动收入应缴纳的个税数额,通过基尼系数法和 MT 指数测算了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结论显示,实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家庭劳动收入与人均劳动收入的 MT 指数分别下降 0. 0013 和 0. 0011,再分配效应相应减少 0. 26 个百分点和 0. 22 个百分点,即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削弱了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进一步测算组内基尼系数,并结合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帕累托最优曲线标准,本文的发现有以下几点。第一,实施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导致居民劳动收入差距加大的直接原因是基础扣除较高。对于年劳动收入高于 6 万元的群体来说,收入越高的个体,享受全额扣除的可能性越大;而年劳动收入低于 6 万元的个体,则只能享受基本费用扣除带来的减税效应,无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带来的税负减少。尽管提高基本费用扣除和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对中低收入者有一定的减负效果,但给中高收入者带来的相对收益更大。第二,与帕累托最优标准相比,无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时,我国家庭劳动收入的分布表现为公平有余、效率不足;实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社会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收入分布更接近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帕累托最优。第三,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对中高收入家庭人均劳动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明显,为未来进一步完善慈善捐赠、子女抚养等扣除奠定了制度基础。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进一步完善再分配的税收调节手段。健全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收体系,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发挥收入调节功能,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非劳动收入的税收调节力度。其次,优化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设定。建立个税浮动扣除机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对教育、赡养、住房、医疗等专项附加扣除实行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增加劳动人群的获得感。最后,加强财政政策的收入调节作用。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财税政策,弥补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制度无法惠及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和贫困城市居民)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贺金社:《“收入差距”的最优标准与启示》,《中州学刊》2011 年第 3 期。

2. 黄晓虹:《个人所得税改革、消费刺激与再分配效应——基于 PSM 方法》,《中国经济问题》2018 年第 5 期。
3. 贾康、梁季:《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问题研究——兼论“起征点”问题合理解决的思路》,《财政研究》2010 年第 4 期。
4. 雷根强、郭玥:《差别费用扣除与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基于微观数据的评估》,《财政研究》2016 年第 6 期。
5. 刘怡、聂海峰、邢春冰:《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调整的劳动供给效应》,《财贸经济》2010 年第 6 期。
6. 罗楚亮、李实:《中国住户调查数据收入变量的比较》,《管理世界》2019 年第 1 期。
7. 孙玉栋、庞伟:《分类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税务研究》2017 年第 7 期。
8. 田志伟、胡怡建、宫映华:《免征额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0 期。
9. 万相昱:《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改进的微观模拟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 8 期。
10. 王鑫、吴斌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世界经济》2011 年第 8 期。
11. 徐建炜、马光荣、李实:《个人所得税改善中国收入分配了吗——基于对 1997—2011 年微观数据的动态评估》,《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6 期。
12. 徐宽:《基尼系数的研究文献在过去八十年是如何拓展的》,《经济学(季刊)》2003 年第 3 期。
13. 许志伟、吴化斌、周晶:《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宏观福利分析》,《管理世界》2013 年第 12 期。
14. 杨耀武、杨澄宇:《中国基尼系数是否真地下降了?——基于微观数据的基尼系数区间估计》,《经济研究》2015 年第 3 期。
15. 叶菁菁、吴燕、陈方豪、王宇晴:《个人所得税减免会增加劳动供给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管理世界》2017 年第 12 期。
16. 尹音频、杨晓妹:《劳动供给对个人所得税改革敏感度——基于微观模拟的动态分析》,《财经科学》2013 年第 10 期。
17. 岳希明、徐静、刘谦、丁胜、董莉娟:《2011 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12 年第 9 期。
18. 张楠、邹甘娜:《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与再分配效应测算——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税务研究》2018 年第 1 期。
19. 张世伟、周闯:《工薪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提升的作用效果:基于劳动供给行为微观模拟的研究途径》,《世界经济》2010 年第 2 期。
20. [日]中田勇:《ABC 分析及在资材管理中的应用》,王之泰、孟淑敏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7 年版。
21. Gini, C., *Variabilità e Mutabilità*. Bologna: Tipografia di Paolo Cuppini, 1912.
22. Musgrave, R. A., & Thin, T., Income Tax Progres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 No. 6, 1948, pp. 498–514.

Calculating the Impact of Special Expense Deduction on Income Distribution

LIU Rong, KOU Xua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611130)

Abstract: The new individual income tax law which provides special expense deduction was fully implemented on January 1, 2019.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pecial expense deduction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tax reform, which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tax structure and economy.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5) to estimate the difference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paid by households before and after the deduction. On this basis,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Pareto-optimal standard are used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special expense deduction on the re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labor income. The study finds that although the special additional deduction weakens the redistribution effect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the overall welfare of the society is improved,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s closer to the Pareto optimal.

Keywords: Individual Income Tax, Special Expense Deduction, Redistribution Effect

JEL: D31, H24

责任编辑:无 明